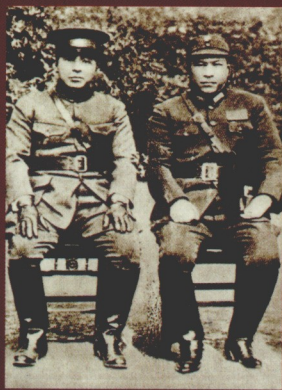


历史的回声

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论文集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回声

——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论文集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姚文琦	卢胜利
副	主	邵持文	李正义
编	辑	杨娟茹	汤彦宜

目 录

在陕西省各界人士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代序)	杨永茂(1)
试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叶文益(1)
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杨卓娟(15)
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看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秦俊林(25)
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理性思考	李 旻(34)
试论杨虎城幕僚与西安事变	梁星亮 黄恩鹏(47)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几点启示	丁雍年(58)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政治主张	杨中州(66)
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苦努力和卓越贡献	张应超(75)
试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调整	朱 霞 钟重明(85)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叶增宽 杳 雨(94)
论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	李秀芳 吴 永(115)

论中共中央应对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	卢 骅(126)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王惠宇(136)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军事因素	张 春 陈合理(148)
西安事变前夕中共对蒋介石策略的演变	刘卫平(157)
西安事变与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研究	薄谊萍(168)
试论西安事变前后陕西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其 作用	杨红涛(176)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作为	贾 哲(184)
邵力子与西安事变	王建云(194)
以军事斗争促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 历史启示	梁仲明(209)
论东北救亡运动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张万杰(220)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郝银侠(233)
论西安事变与中国民族主义	杨昕沫(243)
简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	黄栋法(251)
谈杨虎城的革命胆魄	李望之(263)
试论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影响	刘敬华(269)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及其文化内因解读	张 颖(279)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综合因素分析	贾尧全(289)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杨 昭(302)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阎世恒(312)

西安事变前后陕西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建设	王晓荣 李晓燕(326)
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工作与西安事变	樊为之(337)
抗日民族统战工作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决定性因素	梁 媛 屈志刚(346)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响	张春晓(357)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述论	
	杨震中 孙玲玲(364)
杨虎城陕军余部武士敏九十八军联共抗日的历史	
考察	王建军(377)
周恩来的说服之道——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徐 晨(389)
杨虎城的政治品质与西安事变	崔萍萍(397)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台湾回归问题的若干启示	
	李 方(405)
对西安事变起因的再探索	吴国军(413)
从张学良的抗战思想看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郝润拴(421)
爱国主义——西安事变中一面伟大的旗帜	许红星(427)
十七路军电台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李 敏 陈 颖(435)
浅析杨虎城将军思想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桑 夏(441)
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思考	胡水容(446)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赵 静(455)
论张学良走上兵谏之路的必然性	李斌超(459)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贺颖捷(465)
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地区的学生运动	周喜存(472)
论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关键性作用 ...	柏 严(478)
浅析国际政治力量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影响 ...	肖 妮(490)
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何 琳(497)
论电影《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的建构、传播及局限性	曹小晶(503)
西安事变前刘鼎对张学良的影响	白晓莉(517)
从日军侵华档案中看张学良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抵抗	张洪军(528)
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西安事变部分文电介绍	王建明 刘玉川 刘卫星(540)
后 记	(547)

在陕西省各界人士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代序)

杨永茂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全省 3700 万人民，向已故的张学良将军、向杨虎城将军和与他同时遇难的革命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向在座的杨虎城将军的亲属、向所有仍健在的当年参加西安事变并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及其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上个世纪 30 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危难。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犯江南，并大举向华北扩张，妄图霸占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把西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争取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努力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各团体的爱国力量，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遍及城乡各地。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镇压各界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同时，

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使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感奋而起，要求当局改弦更张，一致对外，团结御侮。就在此时，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月12日清晨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当时的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到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同志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于25日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重大胜利,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置个人毁誉和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义举,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西安事变至今已经过去 70 年了。从那个民族危亡的多难之秋到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无数先烈魂牵梦萦的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也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抚今追昔,我们还可以欣喜地告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无数先烈们,当年西安事变发生地的陕西和西安,如今面貌也已焕然一新。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的不懈努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目前,经济建设已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古城西安作为关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正向着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回顾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我们深切地感到,爱国主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伟大旗帜,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重温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缅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当年爱国志士们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就是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华民族有着追求自由和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外敌入侵、民族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加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70 年前,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那个时代一切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毁家纾难的满腔赤诚和高尚情操,就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己任,团结和动员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为推动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靠的也是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激励和鼓舞全体人民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历史一再证明,无论是哪个阶级、阶层、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能够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携手合作,共创未来。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之后所形成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有着许多矛盾和曲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

团结、进步的方针,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最终得以坚持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最广大的联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凝聚和发挥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而强大的力量支持。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优势,坚持求同存异,倡导体谅包容,使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加和睦融洽,不断促进全社会的团结和谐,把全民族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集中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上来。

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 70 周年,就是要更加努力地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强盛的根本保证。分裂则衰,统一则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世纪,我们面临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重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维护国家统一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为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党和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政策,这是符合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今年 11 月 12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同胞包括各党派、各团体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这表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近年来,陕西与台湾的经贸往来、合作交流日趋频繁,陕西人民与台湾同胞的相互了解不断增强、感情不断加深。去年,我们曾接待了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等台湾知名人士,大家在一起共话陕台合作的美好前景,深切感受到两岸同胞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今后,我们要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继续加大陕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振兴中华是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毕生奋斗的理想和夙愿,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006年12月8日

试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叶文益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36年12月,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东北军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民族利益为重,向蒋介石痛陈大义,反复苦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俱遭拒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就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问题,试作论述,以求海正。

一、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止息了国共两党历时十年的内战,使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国共两党关系,展现出“柳暗花明”的前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在此期间,国民党以其掌握的全国政权力量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入侵的日寇不抵抗,而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则视若寇仇,调集军队,大加挾伐,重兵“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蒋介石看来,倭寇入侵与“剿共”相比,“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①。于是,不惜血本大举

“剿共”，实行内战，把“剿共”作为国民党军队“惟一重大的使命”^②。而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大屠杀的血泊中奋起之后，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顽强地领导红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围剿”。从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围剿”与反“围剿”就成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成为国共两党分裂时期在军事上对立关系的集中表现。尽管国民党依仗其几百万军队对弱小的红军的“围剿”屡遭失败，但还是不断进行下去。因而致使“‘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③。尤其是在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百万大军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从天上到地下，四面八方围追堵截只有10万余人的红军，其结果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其失败，于1936年10月下旬匆忙赶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为动员下级军官执行其命令，蒋还特意到王曲军官教导团讲话，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对于“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④蒋介石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是在发布大规模“剿共”内战的动员令。直至1936年11月西安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仍漠视民意，声称继续“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而对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置若罔闻，竟然集中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红军消灭。中共中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于甘肃省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多旅，粉碎了蒋介石的痴梦。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⑤可见，从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国共两党关系尖锐对立，内战迭起，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实属罕见。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民众均纷纷致电表示支持和拥护。他们呼吁:“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⑥,要求“当此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谁都应当捐除一切的成见和宿嫌,服从整个民族利益”,“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民族的罪人”。^⑦在这民情沸腾的形势之下,遭受扣押的蒋介石从事变中感悟到民意之不可侮,只有停止“剿共”内战,一致对外,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是惟一得民心的良策。倘若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政策,势必为国人所唾弃,自促其亡,因而不得当面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⑧对于蒋介石“剿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是西安事变的功劳,他曾有过这样的评述:“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⑨当时,中共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对日寇、对共产党人态度的转变,及时地将对蒋的政策进行了修正和调整,由原来的“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对西安事变力主和平解决,化敌为友。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共对团结抗日的诚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再次呼吁:“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并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还提出,如果国民党能将上述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作如下保证:(1)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力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

线的共同纲领。^⑩此后，中共还先后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非常明显，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共两党之间尖锐对立，成为互相斫杀的“死对头”，而且这一严重的对峙，历时长达十年。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才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党停止了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⑪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使国共两党关系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原来形同水火、兵刃相见的国共两党，为了挽救民族生存而重新走到了一起，原来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国共两党关系，开始展现出“柳暗花明”的新气象。正如毛泽东于1937年3月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和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等地步”^⑫。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促进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兴起，使全国各阶级、阶层和政党的力量在抗日的旗帜下得以重新整合，从而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西安事变是以突发的“兵谏”形式发生的，似乎带有偶然因素，但是只要深入地探究西安事变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就不难发现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它是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必然产物。

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就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坚决